

冷戰時期台港文藝思潮的形構與傳播

——以郭松棻〈談談台灣的文學〉為線索

簡義明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郭松棻的〈談談台灣的文學〉（1974）發表於香港《抖擻》雜誌創刊號。以此文獻為線索，本論文企圖梳理底下幾個脈絡與問題：（一）本文企圖將1960年代中、後期《盤古》雜誌中的文獻、海外保釣運動時期的論述、1970年代香港文藝雜誌中對此議題的持續討論，還有1970年代台灣的現代詩論戰與鄉土文學論戰當作一個整體的、辯證的、互涉的發展階段去進行研究。（二）上述這個知識連結所形成的跨地域文化場域，是由兩股力量共構而成：在推力方面，是台、港與海外的知識份子對當時國民黨政權的反思與反抗；在拉力方面，是他們對彼時文革時期共產黨政權的樂觀期待與浪漫想像。並且，這批在海外的留學生，因為受到1960年代西方新左翼、反戰、民權運動和婦女運動等等的世界浪潮之洗禮，在經歷知識與理論的轉化之後，因而反省了當時在冷戰結構下帝國主義對第三世界的文化干預與輸出等問題。（三）在冷戰的歷史語境之下，這批在時間幅度上延續前後十幾年，在空間上跨越台、港與北美地域，具批判性與反思性的文獻，無論在話語風格、思考模式與框架上，有其微妙的呼應與類似性，呈現了思想與文體的共振效應。經由這樣的考察，本文認為，如果能將保釣運動與論述的疆界打開，和之前的香港回歸論述與之後的台灣現實主義論述，當成相互影響與流動的整體來思考，才能釐清那段時

期許多糾結的文學與文化議題，當我們在討論台灣文學史的相關議題，就不能僅僅侷限於台灣的框架，也不能以簡單的影響論或架空的東亞想像來整編與置放。

關鍵詞：冷戰、《盤古》、包奕明、郭松棻、保鈞論述



The Construction and Spread of the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inking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during the Cold War:

Using “Discussion on Taiwanese Literature” by Guo Songfen as a Clue

Chien I-Mi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Discussion on Taiwanese Literature” by Guo Songfen (1974) was published in the first issue of *Duo Suo* (抖擻) magazine in Hong Kong. Using this article as a clue, the author aimed to analyse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s and questions. 1. The author treated the articles on this subject published in *Pan Gu* (盤古), a Hong Kong magazine, in the mid-to-late 1960s, the discourses on the Defend Diaoyutai Movement, the continuing discussion in the Hong Kong literary magazines in the 1970s and the debates on the Taiwanese modern poetry and Taiwanese Literature Movement in the 1970s as a stage of a whole dialectic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ed into this issue. 2. The platform created by the intellectual links in different regions was constructed by two forces; one was the resistance to the KMT Government in Taiwan and the anti-KMT feeling shared by the intellectuals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abroad. The other was their optimistic expectation and romanticized imagination of what was happening in the Communist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urthermore, these intellectuals educated in the West had been influenced by the New Left, Anti-War Movement,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Feminism. After having studied these theories, they examined the intervention and cultural exportation from the imperialist powers to the Third World

during the Cold War. 3. In the historical content of the Cold War, these critical and introspective articles written cross a span of more than a decade and in different regions, including Taiwan, Hong Kong and North America shared interesting subtle similarity and echoed each other in terms of their language, logic and frame of mind. They resonat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ir thinking and literary styles.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described abov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only when we break down the boundary between Defend Diaoyutai Movement and its discourse and treat the discourses on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and Taiwanese realism as a mutual influence can we clarify all those tangled literary and cultural issues. When we discuss the subject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we can neither confine ourselves to Taiwan nor analyse it with a simple theory of influence or the pure imagination of East Asia.

Keywords: Cold War, *Pan Gu*, Bao Yiming, Guo Songfen, Defend Diaoyutai Movement Discourse



冷戰時期台港文藝思潮的形構與傳播

——以郭松棻〈談談台灣的文學〉為線索

一、問題的提出：郭松棻為何在香港發表〈談談台灣的文學〉？

郭松棻的〈談談台灣的文學〉刊登於《抖擻》創刊號，¹《抖擻》是一份在香港出版的思想性刊物，但它所聚集的編輯、寫作者多半有海外留學與「保釣運動」的參與背景。

郭松棻發表這篇論文的時候，是以「羅隆邁」為筆名，這個名字在「保釣運動」期間便已經出現過，只不過，在《戰報》2期裡頭發表〈打倒博士買辦集團！〉這篇文章的時候，²「隆」字是以「龍」替代。再仔細檢查一下文章完成時間（1973年11月7日）與出版時間（1974年1月），可以發現，當時郭松棻雖然已經離開加州柏克萊大學，到紐約的聯合國任職，但依舊高度參與、實踐著「保釣運動」的餘緒工作，經常至許多美國的大學和台灣同鄉會演講、開會，並有不少批評與論述性的文字在香港與北美不同的刊物上發表，³不過，此時他已被台灣的《中央日報》貼上「共匪郭×棻」的標籤，⁴這些因為「保釣運動」生產出來的論述，反而無法在台灣流通，一直要到1977年，才重新以李寬木這個筆名在陳映真和蘇慶黎所辦的《夏潮》雜誌上發表三篇談卡謬思想的文字。

如此確定這篇〈談談台灣的文學〉發表的時間與場域是很重要的，在時

1 羅隆邁（郭松棻），〈談談台灣的文學〉，《抖擻》1期（1974.01），頁48-56。

2 羅龍邁（郭松棻），〈打倒博士買辦集團！〉，《戰報》2期（1971.06），頁40-48。

3 這些文章以及許多未曾發表的手稿，請見李渝、簡義明主編，《郭松棻文集·保釣卷》（台北：印刻出版社，2013.11）。

4 在保釣運動第二次大遊行前一日，《中央日報》刊出一篇文章〈周彤華籲僑社警覺 謹防野心分子 破壞愛國運動〉，直接點名董敘霖、郭松棻和劉大任三人為共匪，是中國共產黨的特務：「本報日前接到美國舊金山「西部中國愛國學生聯盟」的公開信一件，揭發潛伏在加州大學的三個共匪特務董×霖、郭×棻、劉×任，利用釣魚台運動使之變質，成為一個反政府事件的陰謀。」《中央日報》，1971.04.08，2版。

間上：此文介於「保釣運動」政治性抗爭結束、文化與論述游擊持續性進行，和郭松棻1974年7月訪問中國這個區間；在刊登的場域中：郭松棻由於黑名單的身分，不能在台灣發表文章，除了釣運內部的雜誌與刊物外，他只好選擇在當時所有華人地區言論相對自由的香港發表。此時的郭松棻，對於台灣文學的診斷，是以第三世界殖民地文學的框架來丈量的，因此，對於沒有現實主義精神、反抗意識的作家與作品，皆有相當嚴厲的批判：

倘說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台灣文學是在衝破殖民控制的窒悶，而要透放民族意識的空氣的話，那麼一九四五年以來，截至今日為止的台灣文學，其主流卻是遺忘了自己民族的形象，而去追逐西方的神，在意識上已經主動向西方繳械，而且更用自己的手往自己身上套上了他們文化殖民主義的枷鎖。⁵

這篇論文是郭松棻在已經出版的文獻中，對於台灣文學性質提出脈絡性理解的唯一一篇。文章共分四個小節，分別是「文學與殖民主義」、「西方的感受和台灣的現實」、「民族主義對現代主義」、「形式主義的氾濫」。從這些標題就可以認知到，他認為要定位台灣文學，絕對不能將之納編在殖民的、西方的、現代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框架之下，在解構殖民主義這個主軸確認之後，從外到內，從經濟依賴到文學順從，郭松棻展開強烈的批判。比如下列的論述：

「台灣的政治、軍事、經濟各部門都一一打上了美國牌的烙印。文化、思想的領域自然難以與這些根本的政策背道而馳，也因此接受了同樣的命運，無形中處處出現了『中美合作』的商標。」⁶這樣的思索，源自社會學裡頭「依賴理論」的基本立場，也意識到了在美蘇冷戰的世界格局中，台灣被美國各種力量介入的現狀。此刻的郭松棻已經因為「保釣運動」的經歷，閱讀了更多政治經濟學的相關著作，也發表了諸多討論台灣政經性質的論文，有這些文獻的認識視野作為支撐，這時，被他檢視的台灣文學與文化現象，便不只是沙特的立

5 羅隆邁（郭松棻），〈談談台灣的文學〉，《抖擻》1期，頁49。

6 同註5，頁48。

場，更是馬克思的目光。⁷所以，台灣文學的發展基因與缺陷，自然也避不過這個框架，從思想到形式，大都承接了西化的文學枝葉。但是，郭松棻不是空洞的談這種蒼白的承繼與影響，他是先揭露了困境的緣起，再連結台灣內部的問題：

什麼是美國的形式主義呢？簡單地說，這是由幾位出身美國南方農業文化傳統的學者詩人們各自發表自己的文學觀而後蔚成的一種文學批評理論，有時稱之為「新批評」。他們把當前世界的紊亂歸咎於科技的發達。憤世嫉俗，與當前的工業社會格格不入，退而隱入個人的小世界。他們在個人主義的基礎上主張詩，推而廣之，甚至於小說，是一個自立自足的有機體，它超越時空而存在。因而在閱讀研究時，可以將作品孤懸起來處理。它的時空因素與作品本身沒有必然的關鍵。在批評實踐上，他們的視野侷限在作品的小天地裡，做句讀詮解的工作，力避對作品作價值判斷；在閱讀時，他們是意象的狩獵者，追求他們特定意義下的隱喻、張力、衝突、諷喻、矛盾語法等等，而他們的目的是為這些作品中的謎語提供謎底。

……

把這一套文學批評法移植到台灣，無形之中助長了保持現狀的意識型態。它忌諱變革，間接助長所謂「避秦」和偏安的生活態度。加以這種批評忽視主題、取材高下之分，而只視隱喻、諷喻、矛盾語法等等為文學創作的鵠的，一般作家便刻意去經營這些東西，結果內容一片空壑，技巧上倒各盡斗奇、賣怪、作偽之能事，小說中的七等生，詩中的洛夫、葉珊、葉維廉都是現成的實例。⁸

很顯然，他的矛頭指向1970年代從「現代詩論戰」一直到「鄉土文學論戰」被

7 簡義明，〈書寫郭松棻：一個沒有位置和定義的寫作者〉（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第二章第三節「在世界的左邊：從存在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探索歷程」，頁60-70。

8 同註5，頁55。

鄉土派質疑的一方。此時郭松棻所推崇的文學家是像吳濁流、鍾肇政、廖清秀這樣的清單，因為他們「試圖完成的作品都屬於大部頭的『江河小說』的範疇，以大篇幅綜攝歷史的進展，凸出民族的顛沛和個人的悲歡」⁹黃錦樹在談這篇文章的時候，提出過這樣的論點：「從文章的語調論式來看，明顯的老左派（殖民、反帝），基本的民族主義立場，其實和陳映真談論相關問題時的腔調立場相去不遠。」¹⁰他的意思應該是說，這種關於台灣文學之鄉土流脈的本質性溯源之見解是老生常談，無甚新奇。的確，如果稍微涉獵、翻讀過1970年代從「現代詩論戰」到「鄉土文學論戰」期間的文獻，這樣的論述到處可見。但是，如果從學術史的角度觀之，這一篇〈談談台灣的文學〉其實不容輕忽。

在2006年底出版的一套《春雷之後：保釣運動三十五週年文獻選輯》的三大冊集子裡，陳映真在前言中指出：「釣運中評論台灣當代文學，評論『鄉土文學』的文章不少，但直接地易裝上場，直接成為王拓的『殖民經濟』論、現代主義批判論、現實主義文學論、參與了鄉土文學論爭者，只有羅隆邁的文章可以證明釣運對鄉土文學論爭的直接影響。」¹¹他在文章中並且還指出至少四個段落、一字不漏地搬動過去。持平來看，這則文學史上引發注目的公案，並不應該將焦點放在意見的挪用與複製上，把王拓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¹²和郭松棻的〈談談台灣的文學〉進行這樣的比對，並不在貶低王拓這篇具有文學史意義之文獻的重要性，畢竟它曾在鄉土文學論戰中引發極大的討論。相反地，我想說明的是，當時這批滯美未歸的釣運分子，除了在運動當時，透過各種管道，從海外不斷郵寄、補給知識和資訊到台灣內之外，在釣運逐漸沈寂之後，像郭松棻這樣的知識分子，還可能透過香港這個重

9 同註5，頁54。

10 黃錦樹，〈詩，歷史病體與母性〉，《文與魂與體：論現代中國性》（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05），頁249-287。

11 陳映真，〈突破兩岸分斷的構造，開創統一的新時代〉，龔忠武等編，《春雷之後：保釣運動三十五週年文獻選輯》（台北：人間出版社，2006.07），頁9-10。

12 王拓這篇文章，我採用的是尉天聰所編的《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遠景出版社，1978.04），頁100-119。這個版本，原文出處是《仙人掌》雜誌2期（1977.04）。事實上，王拓此文在第一節的地方就直接闡明了從海外延燒到台灣島內的保釣運動，對他們那一代的年輕人所造成的影響：「我和我的許多朋友們都是在這個運動中被教育過來的人，而今天社會上普遍高漲的民族意識，也正是當年的這個保釣運動所激發出來的。」（頁102）。

要的第三地，和台灣進行更多暗潮湧的思想聯繫。我還無法澄清王拓是從怎樣的管道和人際網絡，讀到郭松棻甚至更多海外的保釣文獻，但重要的是，往後在論及七〇年代這波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時候，我們必須重新打開觀照的視野，將北美、香港的知識社群與文藝生產置入審視的行列。

後來，我陸續看到了更多從1960年代末期到保釣前後的文獻，資料範圍從香港的《盤古》、《七十年代》、《明報月刊》、《抖擻》等雜誌，到北美各大學所辦的保釣報刊，深覺這個問題值得深入探索，所以，底下這篇論文，打算連結更多史料與文獻，並探問、梳理、脈絡化以下幾個問題：

（一）本文企圖將1960年代中、後期《盤古》雜誌中的文獻、海外保釣運動時期的論述、1970年代香港文藝雜誌中對此議題的持續討論，還有1970年代台灣的現代詩論戰與鄉土文學論戰當作一個整體的、辯證的、互涉的發展階段去進行研究。

（二）上述這個知識連結所形成的跨地域文化場域，是由兩股力量共構而成：在推力方面，是台、港與海外的知識分子對當時國民黨政權的反思與反抗；在拉力方面，是他們對彼時文革時期共產黨政權的樂觀期待與浪漫想像。並且，這批在海外的留學生，因為受到1960年代西方新左翼、反戰、民權運動和婦女運動等等的世界浪潮之洗禮，在經歷知識與理論的轉化之後，因而反省了當時在冷戰結構下帝國主義對第三世界的文化干預與輸出等問題。

（三）在冷戰的歷史語境之下，這批在時間幅度上延續前後十幾年（1960年代中、後期至1970年代末期），在空間上跨越台、港與北美地域，具批判性與反思性的文獻，無論在話語風格、思考模式與框架上，有其微妙的呼應與類似性，呈現了思想與文體的共振效應。

二、香港《盤古》雜誌上的「回歸論述」

1967年10月和11月，香港的《盤古》雜誌，分兩期刊出了包奕明（發表時用筆名包錯石）所寫的〈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一文，造成了當時香港與海外知識圈極大的震撼與迴響。走過那樣年代的香港文化菁英，在多年之後，談及這篇文章及包奕明捲起的風潮，都記憶猶新，如底下鄭樹森所述：

包錯石本名包奕明，父親包華為留美的國民黨老黨工，長期擔任立法委員；弟弟包奕洪曾任職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大學雜誌》時期的張俊宏、許信良有往來，並曾合撰〈台灣社會力分析〉（一九七一年七月），民進黨成立後為少數外省黨籍委員。包錯石一九五〇年代就讀台灣大學法學院，在學期間思想激進，批評時政言論大膽，引起國民校園特務注意而被捕監禁，後因父親關係獲釋，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升學；一九六〇年代後期轉到香港，希望在港真正投入革命活動，在《盤古》第八、九期（一九六七年十、十二月）發表〈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對海外中國留學生和台準留學生的一個建議）〉，引發文化界極大震動。¹³

這樣的震動，日後造成的影響，不只是在文化圈，後來成為香港各種領導階層的人，都曾在那樣狂飆的年代，被此文點燃的思想火花給鼓動過。這篇文章刊出當時，包奕明人還在美國，尚未抵達香港，為何此文會造成如此劇烈的波動呢？其實文章還有一個小標題：「對海外中國留學生和港、台準留學生的一個建議」，顯然，包奕明書寫此文時，是有強烈的讀者意識與指向性的，他希望和已在海外的、或即將出國唸書的留學生對話。對話的基礎是建立在百年來近代中國被外國列強入侵的歷史記憶之上，冷戰造就出的文化與經濟殖民的框架之中，包奕明在文章第二節裡，直接點名軍閥、留學生和買辦，是讓此西方勢力繼續入侵中國的三大支柱：

政治代理的軍閥、文化代理的留學生以及經濟代理的洋行廠商其實都只有三條鼎立的腳。它們本身是副產品，是不足以自我說明的。它們的存在價值只在於它們共同頂住一個鼎體——西方對中國的種種勢力。要了解留學生和新舊軍閥，要了解民國的文化和政治，就必須了解近百年來西方列強和清朝民國發生的種種位差關係。就在這中西位差之中，產生

13 鄭樹森，《結緣兩地：台港文壇瑣憶》（台北：洪範書店，2013.01），頁117。

了三種怪物——軍閥、留學生和買辦。這三種人物都是媒介人物，介於洋人和中國土人之間，這三種人物也都是心屬外國而貌似中國，身在中國而魂在外國的中間人物。買辦魂是他們在外國的總公司和總行，軍閥魂是他們在外國的總司令部和外國武器外國存款，留學生魂是他們在外國的母校和外國文化權威。三種怪物的職業是為西方勢力招魂，相對來說，就是要給中國土人放蠱。招魂幡和蠱引也有因勢制宜的變化，時而有留學生的「現代化運動」，時而有軍閥提倡的「民族文化復興運動」，時而有買辦推行「愛用國貨運動」。幌子變化多端，然而不變的只有一宗——動來動去，中國人心人才和財力離中國日遠，外國人反而收到一切現代化復興化國貨化的利益。在為西方勢力招魂放蠱的大業裡，留學生擔任了一個最突出最全面的任務，因為他們善於操縱符號，舞文弄墨，所以比軍閥和買辦能對西方作更全面系統也更深入靈魂的服務。¹⁴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的敘述風格，看似論理，其實文字有著極強的煽動性，尤其能挑動胸中懷有理想主義，但不知如何反思與實踐的年輕留學生。雖然在文中指出三種身分所擔負的不同殖民任務，但包奕明最想挑明、喊話的對象，當是海外的留學生，這也是為何他會在文章的小標題中有明確的對話指向。當時正在美國學習新的社會學與哲學知識的作者，因為被西方1960年代的學運和各種激進運動洗禮的結果，新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精神，就成為他審視港台留學生看待中國問題的起點：¹⁵

不論洋理如什麼主義和土理如孔孟之教，一旦理有先置，結論跑到分析前面，就都不必研究事實，事實就都為我所用，用到做註腳的地方去

14 包錯石（包奕明），〈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上），《盤古》8期（1967.10），頁25。

15 古蒼梧在訪談時曾經提到：「當時林悅恆的台灣同學包錯石剛從美國回來，這位作家對我們的影響相當大。在所有人都針對文革和左翼思潮的時候，他將左翼思潮帶回香港，因為他從美國回來，美國那時正是新左派運動最激烈的時候。新左派運動實際上也受文革影響，譬如說再教育的觀念就是。當然，具體來說，政治立場、背景都是對立的，但思想有某些共同點，例如：反建制。文革當時也從文化界的角度開始爆發，反對官僚主義、建制上所謂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教育文化方針，再激進點的

了。這種演繹法向「匪情」上一套，各種結論及其附註的證明就蔚為大觀。……這一連串子結論是一氣呵成的匪情，然後在「你是匪諜」或「你原來左傾」的尊號下就把一切懷疑，反證以至願求其詳的研究都謝絕了。……匪情研究既然如此簡易，知識分子自然不必和政府去爭這項小工作了。想高級知識分子學習西方文化之不暇，哪裡還有餘力去研究匪情呢？於是輕輕就把匪情研究拱手送給政府，也好讓政府又多一項政治剿匪的「革命」預算。¹⁶

美蘇冷戰與國共內戰所交織、留下的社會結構，即是讓彼時海外中國留學生成為獨善其身的原子個體，隨著國家機器的思想操縱起舞，不能真正認識分治中的中國問題，只會用鐵板一塊的僵硬認知，以貧窮的形象框住大陸同胞，以萬惡的指涉認知中國大陸政權。接下來包奕明以極為顯著的篇幅，用具體的數據與論證，呈現了他對美國的社會觀察與學院認識，轉譯、分析了美國的貧窮與經濟問題，他認為被留學生與準留學生想像為烏托邦的異鄉，其實有非常嚴重的各式衝突，他批評這批留洋知識分子學到的西化、現代化都只是在象牙塔裡取經而已，「只靠讀書去了解或學習西方，從來也不涉足民間去研究活文化，於是西方社會最新的發展對他們來說，是生疏得很。」¹⁷留學生一心只想著西方的現代化與美好，但那個社會中的諸多弊病，皆被忽視，同樣是貧窮問題，

講平等化。在西方，美國的新左派運動、歐洲的毛派、托派運動都首先在大學發起，大學的師生和文藝界都有參與。美國文藝界有嬉皮士運動，這跟新左派運動完全不同，但共同點是反建制，反現行的制度、要打破現行的制度。現行的制度就是美國式極右派的保守主義，那是一種形式主義、承繼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傳統而來的，或者是由清教徒傳統而來的，已經變成一種虛偽。嬉皮士運動是在日常生活上打破它，左翼運動則是在政治與意識型態上反對它。」見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雙程路：古兆申訪談錄》（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04），頁147。又說：「包錯石先生當時因為在台灣搞過一些反蔣的政治事件而被迫赴美留學……他當時覺得香港可以居留，或者可以在香港發揮作用。他還在美國的時候，寄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回來，名為〈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是一篇大文、一篇鴻文。這篇文章曾經嘗試投給很多香港刊物，包括《明報月刊》，但都不能刊登。至於「友聯」旗下的刊物，儘管林悅恆是老闆，他也無法發這篇稿，結果由《盤古》刊登了。我可以說，《盤古》即使在最左傾的時候也是開放的刊物。刊登這篇文章的時候，《盤古》同人實際上都比較右傾，絕大部分同人，包括我自己，都是反文革的。所謂右傾並不是國民黨那種，它還是對國民黨保持批判態度，所以我們是同情《文星》的，剛才也提過了。我們的意識型態，是英美自由主義那種意識型態。包的文章是反英美保守——也未必是反，他的意識型態是美國式radical、激進的自由主義思想，滲入了一些新馬克思派、歐洲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頁147-148。

16 同註14，頁26。

17 同註14，頁28。

為何在美國，是屬於重要的國情研究，而在蔣介石政權的妖魔化宣傳裡，就只能是不值一顧的「匪情」呢？包奕明在此文的上半部最後，提醒了這個問題：

以天源富足如美國，以人只有兩萬萬如美國，以國內從來不受戰禍波及如美國，以最早遲到工業化成熟而且最早進入大量消費時代如美國，以教育發達如美國，尚且也有貧窮和窮土自助互幫的運動，尚且也有政府插手解決公共問題的現象，難道這在美國就是能放在總統國情咨文裡的「國情」，而在中國大陸就只能是留學生等所輕視的「匪情」？為了不甘心做一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匪諜」或「左傾人士」，我們只有「中庸而行之」，承認那對蔣介石而言是匪情，但對中國人而言又是國情。¹⁸

到了文章的下半部，包奕明的論述逐漸從破到立，進一步指出，如果要從「匪情」的偏見推進到「國情」的研究，身為海外留學生的身分，可以從何處著手，如何進行。並非常有意思的區辨了「大陸的中國國情」和「台灣的中國國情」的不同介入方式：

因為海外中國人和我們這群知識分子的特殊時空條件，對於大陸和台灣的中國國情，我們要有分別對待的態度。對大陸的中國國情，我們要收集資料，研究分析，然後提出心得批評或建議，因此這是一種對國事的間接參與。對於台灣的中國國情，我們也要研究分析，但更要同時把那了解和意見轉化為輿論和行動，形成一種對國事的直接參與。¹⁹

對於大陸國情，必須得先重頭開始，並給予同情的理解，畢竟台港和海外的知識分子對那個社會是非常陌生的，對於台灣國情，因為包奕明曾經參與其中，並經歷了從集群結社、議論時事的黨國大老子弟到因政治因素被囚禁的過

18 同註14，頁33。

19 包錯石（包奕明），〈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下），《盤古》9期（1967.12），頁32。

程，²⁰最後才遠走美國留學，並在香港重新發聲，因為時空距離的拉長，身心從囚禁到重獲自由的經驗使他主張對台灣的蔣介石政權不能僅止於了解，並且必須介入與改變。

文章從第七節開始到第九節，包錯石提出十點意見，指出「研究大陸的國情乃是絕對符合現實功利以至於理想的」。²¹這些意見在歸納之後如下：1.民主的絕對性與相對性價值必須被重新辯證。2.必須對科學與工業化的技術、內容與影響進行的真實研究。3.中國留學生共同研究「中國」的責任、優勢與必要性。4.留學生人格的形成受到原本社會的「存在限制」，所以更應反過來以研究回饋養成人格的社會。5.喜歡「反傳統」的留學生更應該研究中國的「國情」。第6到第9點則是用反諷嘲弄的語氣，希望留學生還是要回來重新認識「中國」，如這樣的句子：「打麻將有三缺一或作夢的空檔，讀金庸巨著袖珍本有且聽下回分解的空檔，週末空氣壞有不便郊遊的空檔、坐地下車或巴士有人一卷的空檔，吹牛談天有健談者終於疲倦的空檔，等瓊瑤戴著「皇冠」每月施施而來也有空檔。把這些空檔利用起來，就以研究大陸或全國國情來填空，看點雜誌或銀紙，甚至讀點書，積微成漸，也很有可觀的。」²²更有意思的是第10點，包奕明給了一個非常文學性的句子：

孤獨的影子和鄉愁的夢。²³

20 曾經和年輕時代的包奕明互動過的日本人淺井基文表示：「那群知識分子的中心人物，記得沒錯是國民黨高幹的兒子名叫包奕明的人，聽說後來他去了當時的西德留學，那時在池田的住處，十幾、二十幾人同時聚集，喧嘩吵雜，議論各式各樣的主題，包括批評國民黨的，當時是那樣的沙龍式氣氛。我那時中文還跟不上，但總覺得這個聚會流露的『假正經』氣氛以及特權階級子弟們聚集，不用擔心被抓的不負責任（給我的感覺是這樣）的高談闊論、發洩發洩的自我滿足的感覺。」見淺井基文著，鄭宏譯，〈我所認識的陳映真以及1960年代的台灣〉，《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6期（2012.03），頁350-351。同時，淺井基文在回憶那時的陳映真和包奕明時，認為他們並沒有顯著的左派思想：「當時我並不覺得陳映真『偏左』。反倒覺得他絕對不支持蔣介石獨裁體制，因此傾向認為中國的方向才是正確的。因此以現下用語的『左』或『右』來判斷當時的陳映真，我認為並不恰當。我想不只是陳映真，連同在他身邊的知識青年們如包奕明等，也不該將『偏左』的用語套在他們身上。尤其包奕明只是不認同蔣介石體制，我想他並沒有更進一步多說什麼。」，頁371。

21 同註19，頁33。

22 同註19，頁36。

23 同註19，頁36。

這不單單指涉寫作此文的包奕明在海外留學與生活的精神狀態，也會讓讀此長篇大論的留學生們心有共感，從尖銳的提問、論理的提醒、挑釁的反諷，到最後以情感的召喚作結，難怪此文在當時會產生這麼多的注目與影響。包奕明旋風當然不會僅只如此，除了在《盤古》，他也以本名在當時的《明報月刊》寫出〈民主社會動員下的道德多數、少數和知識分子〉一文，²⁴以更為學術性的、社會學的方式處理了大陸和台灣兩個社會的不同動員與解體狀態，逐漸抬高對中國大陸的認同，批判台灣社會的經濟依賴與道德冷漠。

《盤古》在發表了包奕明這篇〈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的文章之後，引發了後續討論，批判的文章雖然存在，²⁵但因為無法正面回擊，也未針對其「運用的社會學理論和他以『社會動員』為中心的認同理論，提出有力的反駁。在這種情況下，包錯石這套以新辭彙、新姿態組裝起來的認同理論，正好迎合新一輩希望突破老右派知識分子，在『反共八股』之外尋求新話語空間的需要。」²⁶

接下來幾期的《盤古》，還刊出了幾篇系列之作，這些文章大抵是延續著〈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的立論基礎與關懷指向，只不過作者已不是包奕明一人，更多時候會看見集體署名，由包奕明或他人執筆，如〈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這篇文章即為包錯石、張懷人、邵先凡、陳齊、胡莒、孫行、林向華、夏喬峰、葉影華、張介武、黃韶鎮、蒙樸等人合意，包錯石主筆，〈海外中國人的回歸與中國生活方式的重建、創建與實建〉此文為胡菊人主筆，由包奕明、林悅恆、胡菊人等人合意，很明顯地，一種集體文化作戰、思想攻堅的趨勢已經形成，「回歸派」知識社群的集結方式，除了在言說上形成輿論能見度之外，也有具體的實踐作為，即是在友聯出版社林悅恆的支持下，成立「創建學院」，類似民間自主的自由大學，用體制外的方式連結同

24 包奕明，〈民主社會動員下的道德多數、少數和知識分子〉，《明報月刊》3卷4期（1968），頁2-13。在羅永生〈六、七〇年代香港的回歸論述〉，《思想》19期（2011.09），頁117-140。一文中，討論到此篇文章時，他誤以為包錯石是本名，包奕明是筆名。

25 如李金曄的文章即指責包奕明的論述是在替中共宣傳，招降海外的知識分子。〈為發「回歸」熱的人醫病——從包錯石的文看包錯石〉，《盤古》17期（1968.09），頁2-5。

26 羅永生，〈六、七〇年代香港的回歸論述〉，《思想》19期，頁131。

志與各領域的知識分子。²⁷

而上述幾篇以聯名的方式發表的論述，更可以讓我們看到一種新的海外知識分子世代的集體發聲，〈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一文用一個又一個的提問，展開它雄辯的語氣，整篇文章總共問了底下13個問題：

什麼是海外中國的分裂？

什麼是海外中國人的回歸運動？

什麼是原子化？什麼是出發點的民族主義？

為什麼海外中國人會失落、「獨立」而陷於無能無屬？

為什麼要透過三大動員方式向現代化的中國回歸？

為什麼走向現代化的中國人民是海外中國人回歸的主體？

什麼因素阻礙了海外中國人的回歸？

如何在民主分裂和民族分裂之間向中國回歸？

為什麼海外中國人要反對民主分裂的「蔣獨」？

為什麼海外中國人要向民族分裂的「台獨」質疑？

為什麼「台獨」蔽於「蔣獨」而走向極端主義？

為什麼台省人、外省人和華僑的三聯民主運動是邁過「蔣獨」之障的回歸之路？

什麼是三聯民主運動的初步工作？²⁸

將這些提問歸納來看，其實都是指向知識分子如何從政治的分裂和精神的流亡的狀態中，「回歸」到「中國」的問題，但如何「回歸」？到怎樣的「中國」？則是充滿話語的想像與縫隙。亦即，在那個時空節點上，雖然在中國大

27 「『創建學院』全名為創建實驗學院，1960年代後期，由林悅恆、戴天、文樓、包錯石等創辦，採自由大學的反建制精神，上課重自由討論，不設考試、不頒證書；課程包括詩作坊、藝術、建築、哲學等，戴天、古蒼梧、文樓、戴海鷹、鍾華楠、胡菊人、林悅恆、李天命等均為導師。學院位於香港九龍塘多實街十四號，為友聯出版社物業，由時任友聯出版社社長的林悅恆借出。」鄭樹森，《結緣兩地：台港文壇瑣憶》，頁117。

28 包錯石（包奕明）主筆，〈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張懷人、邵先凡、陳齊、胡莒、孫行、林向華、夏喬峰、葉影華、張介武、黃韶鎮、蒙樸等人合意），《盤古》10期（1968.01），頁2-16。

陸的共產黨政權尚未在國際政治的版圖中取代在台灣的國民黨之合法性地位，但是，以包奕明為核心的這群在香港發聲的知識分子，已經讓我們看到了政治認同即將轉變的氛圍，同時，如果要能回應上述的諸多提問，散居在海外的知識分子們就必須得重新思考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由於多數的菁英都是留學歐美，所學習的專業與文化都源自於冷戰結構底下資本主義強調個人主義的意識型態，所以這篇文論要先喚醒海外知識分子們獨善其身的原子化思考：「歸屬是人類存在的必然，分裂卻又是我們海外中國這個社羣存在的事實，而回歸與原子化是不能兩立的，這是悲劇之所由。要回歸就不能原子化，要原子化就不能歸屬。」²⁹ 儘管這樣的語言依舊延續著民族主義的主要調性，想要重新凝聚因世界冷戰格局形成的動盪與離散，但它其實更想強調的是，身為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仔細思索現狀、認清政治現實之後，是沒有，也不應該有其他選擇的，這個政治判斷與宣示源自於他們當時接受的兩岸「國情」之對比與瞭解：

大陸的中國政府有心走上政權的路，雖然十八年來，它只在專政的要求和集體的規制中去發動民意民力，還不能達到放手讓人民自動發展的程度。台灣的蔣氏政權竊盜了國民革命和早年國民黨的政權，四十年來，已經淪為一個強弩之末的治權了。

不論中共的功過得失，有一個事實卻是誰也不能否認的，那就是中共有效政府的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和國民教育之下，大陸民眾達到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動員。在此以前的各政權治下，不論是帝制或是民國，中國社會從來沒有舉國上下的充分發揮過中國人的潛能和中國土地的潛富。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事實，因為中國是否是一個夠資格的大國以及海外中國人是否值得向中國人民回歸，都只能以一個充分動員了的中國來作衡量，而不能以一個所謂的「睡獅」來作衡量。³⁰

基於對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也鑑於對蔣介石政權的失望與抵抗，此時香港的

29 同註28，頁5。

30 同註28，頁9。

「回歸論述」充滿著對文革時期中國政治與社會現實的樂觀想像，這樣的熱情與思索，也在1970年代一路蔓延到北美的留學生知識圈，成為郭松棻所處的柏克萊保釣陣營的運動信念。海外知識分子的力量只有往中共治理的政權靠攏、集中，才能共同打造新中國，方能重建烏托邦。這已經是非常明確的「回歸」論述，已非有太多爭辯空間的立場確認，在此文的最後正式發出對台灣蔣介石政權的棄絕宣言與宣戰，並以極度激情的口吻號召中國人民的「民主整合」：

二十年了，不論什麼人的「惡夢」都應該醒一醒了，夢醒的人也有，只是有些參差，有人是大醒的清明，有人是半醒的混沌，有人是初醒的朦朧，有人是驚醒的錯愕，有人是吵醒的淆亂。但只要有人醒來，看見情勢險惡，就有叫醒憩睡著的義務。一次叫不醒，我們就再叫一次，而且持續不斷地叫下去！……

但願有一天——我們能看見太平洋西沿一股中國人民主整合的清風迎著朝曦上昇，也看見一股承封建文毒、吸軍閥兵毒、聚軍閥錢毒、拜外國奴毒、創反共騙毒、行獨裁政毒的濁氣隨著我們的惡夢而雲散。

啊，你，中國人，不要在祖國危難時離棄她。³¹

我們可以發現，此時香港「回歸論述」的集體書寫，到了文章結尾之處，幾乎都以民族主義的情感動員方式想要召喚出潛在的、沈默者的國家認同，但這樣的宣示本身除了誘發情感生成的效果之外，並未提供更實際的認識「中國」的方法與知識地圖，比如另一篇文章由胡菊人主筆的〈海外中國人的回歸與中國生活方式的重建、創建與實建〉雖然想要論述「回歸」之後，如何「重建、創建與實建」新中國，但綜觀全文，其實也多半是泛泛之談，未能有他們所強調的實證的、科學的之分析效力。³² 這樣的文體，如同文革時期中共對外統戰的

31 同註28，頁16。

32 如底下這段文字：「在『重建』與『創建』之外更要『實建』，那是說我們必需處處作實驗、刻刻做推廣的工作；是要讓人民大眾都能參預，都能做效與實行。……因為『實建』，纔能與人羣結合，纔能有力量，纔能獲得血肉相連的歸屬感，也纔能因此達到我們原來的目的。這是一項需要集合眾多人的智慧與創造的工作，這也是一項任重而又道遠的工作，這也是需要我們拿出所有熱情來從事的工

宣傳手冊，已不必用實質的論理過程來說服，而是訴諸不需解釋的民族血緣情感，至此也看出了《盤古》的立場轉向，如羅永生指出：

《盤古》雜誌的初期，表現出濃烈的反共立場，在創刊的年頭，適逢發生「六七暴動」，《盤古》強烈地發出了譴責的社論，批評左派分子。但在不足十期之後，發生了一場「回歸」問題的爭論，標誌著《盤古》雜誌由右向左的急轉，使這份刊物在短期之內急劇地轉變為一份毛派的親共刊物，在1970年代之初更成為香港毛派（即「國粹派」青年學生運動的喉舌）³³

《盤古》雜誌的分裂與轉向，是另一個複雜的議題，本文無法多做討論，但我想指出的是，綜觀這一節論及的「回歸論述」，不管是以個人或集體聯名的方式書寫，都有若干相符的特徵，這些文本在敘述風格上，幾乎都混雜了學術的、理論介紹、分析的語言和政治性、煽動性極高的情緒語言，它們比較接近在街頭吶喊的、社會運動的文體，字裡行間都企圖喚醒沈默的、獨善其身的人民，更想要以集體動員的方式，遂行更大規模的社會改造與革命。率先發生於北美各大學中的保釣運動，可以說是香港這股重新尋找國家認同、民族主義回歸浪潮言說的延續。底下，我們就要將目光重新轉回郭松棻的文論上，看他在保釣時期的思考與書寫，是否承接、轉化了這股思潮。

三、跨地域的知識流動與文學史疆界的重新想像

郭松棻在保釣運動正式展開之前，也曾於《盤古》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阿

作。我們不止要努力著在海外中國重建我們和平樂觀的人世間哲學，追尋我們湮遠歲月以來深植於下一個中國人民心中的生命之『根源』，更進而努力恢復我們民族的『自信』與『自尊』，讓我們共同再歸屬於一個『羣體』，即使我們是在驚濤駭浪之中，在顛沛流離之中，在集中營與黑越越的水牢之中，在強制、威嚇、驅逐令四面是那令人震撼的『歌聲』而使我們情不自禁的懷念間關萬里的家園的境況之中，我們仍堅持某種信念，我們仍能挺起胸膛；如果我們注定了終生流浪，讓我們有一同的步伐，如果我們命定要流淚，讓我們一起哭泣，如果我們必定要受苦，就讓我們一起受苦！但願我們有一天，能唱著海外中華的歌，含著無法自制的眼淚，一起回去擁抱那片錦繡大地。」，胡菊人，〈海外中國人的回歸與中國生活方式的重建、創建與實建〉（此文為胡菊人主筆，包奕明、林悅恆、胡菊人等人合意），《盤古》11期（1968.02），頁6。

33 羅永生，〈六、七〇年代香港的回歸論述〉，《思想》19期，頁125。

Q與革命〉，嘲諷的言說方式，簡直是上一節徵引的《盤古》許多文章之翻版：

如今的洋人，一有機會都很想闖進中國大陸看個究竟。然後帶著一架攝影機，這裡攝攝，那裡攝攝，搓合起來便是一部影片。拿出來放映，就可以賺錢，這又是托著「毛福」的另一種行業。

這樣的影片，在美各大學放映時，中國學生也極愛看的。最初的心理也無非是想看看久違的家鄉。然而事有不料之處，影片裡屢屢出現了中國進步的景象，銀幕上一片紅綠紅綠的，把美國學生惹得興奮無比，一時按捺不住，便拍手喊叫，終於在戲劇裡樂不可支起來。

於此時，摻在中間的中國學生，大抵是維持著斯文的風度。然而久年受氣的心理，一時看到中國共產黨在往前衝刺的景況，在黑暗裡不免也慢慢的高興起來。於是隨著洋人的興奮而興奮，在興奮之餘，卻又慢慢的自傲起來。彷彿自己便是銀幕上的共產黨，共產黨也便是自己。這般如意的思想下去，待散場之際，中國學生的胸膛裡早已溢滿了傲然之氣。這時節，拿洋人看在眼裡也就格外的不順眼，似乎中國人本就會高你們一等，而「你們是什麼東西的呢？」

便在此時，我彷彿又看到了久違的阿Q，而又那樣的接近。然而，上文已說過，待我要指出那個是阿Q來時，卻又不易了。看看一個個在西裝之內的中國學生也都還正常，把某某指為阿Q是武斷的，也是危險的。於是這回又漸漸令人不甚了然起來。

然而於別的時光，似乎確鑿又可以看見阿Q了。那總是非常別緻的一群。……這一群大抵繼承了中國傳統的知識人的觀念，隨時要把時代的重荷負到自己的肩上。於是，他們一閒下來，就落開牙床，批評社會這般那般，弄得滿屋子儘是火爆味，而且每每要辯得口沫橫飛、嘴唇發白而後罷，遠遠的望去，確乎個個都似時代的前鋒人物，不能等閒視之。然而多看幾次，便感到腐爛的社會仍在那兒腐爛，而他們也仍遠遠的在另一邊罵山罵海，似乎不久的將來還不致有什麼會發生，雖然他們卻

總是很肯議論「改革」或「革命」的事。就這一點上說來，這別緻的一群彷彿又落在阿Q的背後了。因為阿Q終於憤憤的要去參加革命黨，除了了悟群體的重要性以外，同時還及時草就了他獨自的一套革命計劃。……相形之下，那別緻的一群未免落得太空乏，太不實際。不如阿Q有了革命計劃再去談革命來得札實。³⁴

這篇文章的文氣可說是極其嘲諷和煽動的，也是郭松棻日後比較少見的寫作文體，酸言反諷的意味比起包奕明系列文字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我們可以從文本裡讀出寫作者所處的時空脈絡，已然從香港位移到美國，並明確地使用了魯迅著名的、諷刺國民性問題的「阿Q」這個隱喻，此文讓我們看到了郭松棻後來在釣運期間所寫下的諸多批判海外知識分子論述之前聲，也看到了他對當時不同型態的留學生之隱喻和批判，這樣的敘述背後，預告了沈默者的覺醒，並想要製造行動者集體重返的可能性。Alain Touraine在論及西方左派知識分子的社會運動思路時曾說：「在分析某支配系統後，認定它不可能發生什麼內在改變，並看出進化的自然律必然會與既得利益者的抗拒相對立。他們因此認為，革命應當將權力賦予科學和知識，賦予學者和科學家，以對抗資本家。」³⁵這樣的集體行動彷彿就是啟蒙知識分子的吶喊與召喚，儘管在將革命託付給知識和啟蒙者之前，郭松棻已經試圖分類與針貶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並在運動期間花了極大心力將這個命題擴展與深化，但他和主張「回歸論述」的《盤古》諸君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柏克萊保釣社群在運動開始之前即開始進行知識儲備，在一篇名為〈中國近代史的再認識〉的手稿中，我們看到了他們對台灣的歷史認識、社會情境和國際政治現實的判斷，當然也看到了期待海內外知識分子能夠團結起來的吶喊：

從一九四九年開始，我們在台灣接受一套偏執的政治、文化觀念。這套偏執的似擬理論（pseudo-theory）越來越扼殺了我們的思想的自由。

34 鐵曇（郭松棻），〈阿Q與革命〉，《盤古》36期（1971.01），頁32-33。

35 Alain Touraine著，舒詩偉等譯，《行動者的歸來》（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05），頁326。

最後它變成不容懷疑、不許辯議的鐵律在這鐵律的霸持之下，價值被顛倒，歷史被拐扭。挺身出來講話的知識分子，或有計畫的被迫害，或在一夜之間被逮捕。我們一丁點的批評都不許有。

在這島上，愚民變成最優秀的公民。

我們從台灣出來以後，逐漸有了了解現局的機會。也開始有機會拾回我們的歷史——特別是我們的近代史。

當我們生活在六十年代裡，我們不許看我們父輩所曾生活過來的二十、三十、四十年代。彷彿我們原來就沒有過去，沒有歷史，而是石縫裡蹦出來的一批猴猴們。在台灣我們就這樣被隔絕了。同時我們被迫吞食美國文化，把表面打點得叮嚙玲瓏，硬是想把整塊島嶼打扮成出落得很體面的寡婦。

經濟的繁榮不能代表政治的開明。「很多鄉間的人家都有了電視」並不能證明進步。插在一家家鄙陋、污穢的農家屋頂上的天線，並不能替鬱結在每個人心底的失望講一句話。

台灣的經濟再繁榮，觀光事業再發達也掩飾不了一個鐵的事實：台灣目前有四萬的「政治犯」。

在被迫無我、忘我、喪我的愚民世界裡，有時我們也從昏噩裡猛醒一下，然而總是抬出一九一九年來。如果我們不知道一九一九的前後關鍵，這類招牌總是無濟的。

到一九七〇年，我們看到的自己仍是哈哈鏡裡的自己。似乎一個較為實在的自己不見了。因為回頭看時，竟是一堆被拐扭的歷史。

我們要把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中國史，從專制政權的土蓋裡挖掘出來，還大家一個真面目，這是文化認同的真直途徑。我們應該充分利用較為自由的美國環境，把中國近代史（當然不只近代史，也不止「史」而已）儘可能的還原到它的本真。是什麼就說什麼。

如果真理抵觸了某一政體，我們的本意並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我們不依附任何當權的政黨的政策，我們不把知識販賣給政權。

將來的鬥爭必然是知識對政治，知識分子對政權的鬥爭。

如果文化寄生在政權下，文化便只能是姨太太。如果不能把文化從任何政權的霸持下解放出來，知識分子白活。如果文化還不能抵制強權，我們把文化武裝起來，讓文化去戰鬥。

海內外的中國知識分子聯合起來！³⁶

這份檔案雖然只是「大風社」草創期的手工製作，可是卻濃縮了後來柏克萊釣運的精神與行動方針，從破到立，面面俱到。在批判的面向上，我們可以從上面這篇〈中國近代史的再認識〉看到他們的反省：台灣知識青年被1949年的國民黨政權之奴化教育蒙蔽了眼睛，對1920年代之後的中國歷史與社會發展完全無知，且帶有偏見，台灣有再大的經濟成績，都只不過是因為美國的庇蔭與掩護，如同「把表面打點得叮噹玲瓏，硬是想把整塊島嶼打扮成出落得很體面的寡婦。」所以，往後的鬥爭，絕不能依附在所謂的政權之下，「必然是知識對政治，知識分子對政權的鬥爭。」在這個宣言之後，「大風社」羅列了一些日後他們要進一步去探討的人物和歷史事件，名單有：「人物研究：魯迅、陳獨秀、瞿秋白、費孝通、梁漱溟、聞一多、李公樸、巴金、柏楊、李大釗……事件研究：托派運動、南京大屠殺、無政府主義運動、二二八、社會史論戰、「自由中國」案、現代中國學生運動、二萬五千里長征……」³⁷這是他們想要重新學習、補課的清單。很明顯地，這份名單是當時台灣政府的言論與思想禁區，這些議題與人物多半是帶有社會主義思考與關懷的文學家和社會學家，由此可見，柏克萊保釣社群在知識整備的階段所進入的文化脈絡也是有其反抗國民黨史觀的用意。從以上分析可以得知，此份通訊所透露出來的精神是：掃除迷魅，重新找回「自己」的歷史，知道「自己」是誰，座落在世界的什麼方位，就文體的性質來說，也就是像魯迅在1930年代所開啟的意義那般，具有啟蒙與革命的風格，但這樣的歷史觀與實踐方向，更加親近的淵源與影響，還是可以從包奕明等人所發展出來的「回歸」論述上找到蹤跡。

36 本文因為是手稿，加上尚未正式出版，故為了底下討論的展開，我將它比較完整的徵引而出。郭松棻，〈中國近代史的再認識〉，《大風通訊》（1970.05），頁1-2。

37 同註36，頁2。

進一步分析，他們所說的「自己」和「中國」，當然是有其史觀的，「大風社」的核心成員的歷史認識自然是：台灣和大陸只是因為國共內戰加上國際冷戰結構形成的暫時分離。這個階段的他們還未出現認同上的糾結，台灣的未來是要和大陸連結在一起思考的，從今天的角度來說，這樣的主張會被稱為「統派」或「大中國主義」，不過，在下這樣的斷語之前，可能要回到當時的時空背景才不會失焦。更重要的是，此時這些年輕人對台灣政權和中國政權的認識是處於資訊不對稱的狀態，他們來自台灣，對國民黨當局所統治下的社會，自然有強烈失望的感受；來到美國留學之後，1960年代西方世界的反戰與反政府之社會氣氛對毛澤東又是如此頌揚，在沒有親身面對中國的社會經驗之前，自然對那片土地會有寄託的夢想，更何況，從知識層面來說，魯迅、陳獨秀所代表的人格與典型，當然是力量極大的召喚，因此，我認為「大風社」此時的信念必須放在這些角度上去理解。

在此視野支撐之下，在今天重新去翻讀釣運展開之後，以柏克萊的台港留學生為主導的《戰報》和《東風》上的論述，皆可以尋繹出非常類似的問題意識、分析方法與實踐哲學。如果我們從郭松棻在釣運期間非常有名的幾篇重量級論述〈當頭棒打自由主義者〉、〈打倒博士買辦集團！〉、〈台獨極端主義與大國沙文主義〉加以檢視與分析，就可以發現，1970年代初期在北美加州柏克萊大學的這群參與保釣運動的核心分子，他們論述問題的模式，尋找解答的方向和1967、1968年由包奕明等引起巨大反響的「回歸」論述，是同一流脈的產出。在《戰報》第1期中，郭松棻的〈當頭棒打自由主義者〉³⁸對自由主義的形態提出八種類型的分析，語氣則多帶嘲諷，比起〈秋雨〉那篇以殷海光為鑑的文章來說，郭松棻更加直接地表露對自由主義這種思想的不信任。發表在《戰報》第2期的另外兩篇文章，〈打倒博士買辦集團！〉³⁹和〈台獨極端主義與大國沙文主義〉⁴⁰則是對「知識分子」的意義，和台灣與中國的前途何去

38 郭松棻，〈當頭棒打自由主義者〉，《戰報》1期（1971.02），頁17-21。

39 郭松棻，〈打倒博士買辦集團！〉，《戰報》2期（1971.06），頁40-48。轉載於《生活與學習》7期（1971.08），頁4-19。

40 簡達（郭松棻），〈台獨極端主義與大國沙文主義〉，《戰報》2期（1971.06），頁52-59。轉載於《生活與學習》7期（1971.08），頁25-38。

何從，提出他更全面、更激進的看法。

〈打倒博士買辦集團！〉曾經在當時的海內外知識圈引起極大騷動，⁴¹ 郭松棻是以第三世界反殖民的視角來批判這群「天之驕子」的，並非只是泛泛地嘲諷，他先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脈絡化，溯源到百年前的列強入侵，緊接著，再指出國民黨統治階層的接管幾乎是以買辦集團的方式在進行，等到它退據台灣之後又以同樣的方式治理這個土地，再利用冷戰結構的矛盾性，向美國政府輸誠與傾斜，成為帝國主義在東亞的代言人，而窩在美國高等教育機構裡頭學習各種領域的這些「洋奴」，正是連結帝國和台灣最重要的傀儡：

二次大戰以來，美國軍經勢力之滲透歐亞，企圖與蘇聯雄霸世界，尤其美國在歐亞各小國利用CIA製造政變，建立傀儡政權，替美國服務。正當覺醒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企圖擺脫美蘇控制，建立第三世界，建立自己的文化、文學、藝術、政治制度、社會知識的時候，在自己的陣營裡卻出現了一群群寧願與美國利益認同，臣服於美國侵略文化，一心在美國的傀儡政權下求安、求活、求榮、求名的洋奴們，這一群群洋奴分別散居於政界、文化界、學術界、教授群，直接或間接以維持美國殖民自己國土為己職，純粹反對改變美國軍臨控制自己國家的殖民現狀。這個現象是世界性的，而解決這個問題便是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一個大課題。⁴²

跟包奕明的論述比較起來，郭松棻此時的批判更為猛烈與具體，文章裡頭還對當時歸國學人不斷移植西方的「價值中立」與眾多現學現賣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診斷台灣的研究，提出嚴肅的批判，就這點來說，他比包奕明更具有主體的自覺，也更具備「反身性」（self-reflexive）的特質：

41 「《戰報》第二期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九、十日全美大示威後出版，……傳達出當時參與其事者的悲憤心情。郭松棻的重點文章〈打倒博士買辦集團！〉傳誦一時，引起重大波瀾。」見劉大任，《我的中國》（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00.07），頁74。

42 同註39，頁45。

第三世界的國家，開發中的各民族，甚至美國本國內的受壓迫的少數民族——特別是黑人、亞洲人等，所需要的社會科學，不是描述、解釋現狀的科學，而是針砭、反抗現狀的科學。美國的社會科學主張「客觀」、「無我」，主張社會研究者電腦化，這是不科學。任何社會研究者必須考慮研究每個個人的主觀意願、然後將這組主觀意願放在客觀環境中，研究彼此的衝突、矛盾，彼此的協調、綜和；特別是社會科學家自身的興趣、品鑑力、利益關係、家庭背景、社會地位等等都得納入研究的範圍內，因為這些因素無形中塑造了一個人的世界觀，影響了一個人觀察事物時所採取的觀點。美國的社會科學標榜「客觀」，其實這「客觀」的觀點是出自美國中產階級為維護美國現狀的主觀心理。這一套社會科學對革命中的美國黑人是個死敵，對亞洲人民也是個死敵。然而我們的留學生卻一時惑於他們所標懸的「客觀」、「中立」、「科學」等美詞，不深究個中理據，盲目攀引，死心介紹，一心想把這套社會科學搬進台灣，這無形中鞏固了美國對台灣的文化、思想的殖民。⁴³

科學中立與客觀的神話就這樣被郭松棻的反思掀開，這項批判的命題當然也是指向被現代化意識型態扶植起來的台灣現代主義文藝思潮，將上述幾段〈打倒博士買辦集團！〉中的文字跟論文一開始提到的〈談談台灣的文學〉連結起來看，就可以確認郭松棻在1970年代初期的台灣文學史觀是想在去冷戰的行動意圖中，進行反殖與反帝的論述，文學是應該、也可以介入政治與現實的。只不過在文學「內容」與重點作家的典範建立工作方面，他從台灣內部援引、嫁接了許多實質的研究與史料，唐文標、張良澤、林載爵陸續在1973年的《文學季刊》和《中外文學》等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日據時期以致於鄉土派作家如鍾理和、楊逵等人的研究。⁴⁴和唐文標密切往來的郭松棻，沒有理由不會接觸到

43 同註39，頁47。

44 蔡明諺，《燃燒的年代——七〇年代台灣文學論爭史略》（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11），頁231-237。蔡明諺並指出，1973年1月12日，香港的《中國學生周報》刊出署名為「永和」的文章〈台

這些資料，唐文標亦曾以謝基民的筆名，在《盤古》發表了一篇〈困獸之鬥的港台文學〉，此篇文論和他在台灣引發的「現代詩論戰」系列文章以及晚出的郭松棻的〈談談台灣的文學〉可說同一個思考脈絡下的產出，它們都對沒有現實感的、臣服於商業主義與外來文化的台港作家提出批判。⁴⁵從以上論述與不同地域之間的文藝思潮之互動情況來看，本論文在開始之處所希望描繪的台灣文學疆界的跨越與重構，應該具備了繼續發展的基礎。

再看〈台獨極端主義與大國沙文主義〉此文，以「極端主義」這個概念，批評台獨運動，在〈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一文中已經出現，但不同於香港方向明確的「回歸」，郭松棻也分析了中國統一運動可能帶來的沙文主義問題，他認為「中國統一論」會被「台獨」指責為大國沙文主義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此時「統一論」的「立論基礎是形而上的、是空想的、是反歷史的。」，並且，有六大危機是「統一論」應該要去面對的，分別是：

第一、「領土完整」的玄想。

第二、機會主義的蠢動。

第三、遊說主義的迷惘。

第四、社會主義的空談。

第五、議會主義的幻滅。

第六、異立特（elitism）主義的架空。⁴⁶

由此可知，郭松棻此時的國家認同或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並非建立在「大國」的妄想上，而是社會主義的理想，扁斥菁英主義與依賴國際強權的機會主義，並對任何形式的獨斷與暴力，都保持警覺的距離。相同地，他對台獨的主張，也提出他的質疑，共有四點：

灣的鄉土文學與台籍作家》，此篇文章從鄉土的立場對台灣文學的整體發展有高度清晰之掌握。由此可見，郭松棻的〈談談台灣的文學〉亦非首次以現實主義觀點在香港發表的論文。

45 謝基民（唐文標），〈困獸之鬥的港台文學〉，《盤古》49期（1972.08），頁47-52。

46 簡達（郭松棻），〈台獨極端主義與大國沙文主義〉，《戰報》2期，頁52-54。

第一、「必然性」的地方主義。

第二、「獨立先於一切」的形上論。

第三、二二八的誤解。

第四、國際透視力的薄弱。⁴⁷

在講述台獨的問題之前，郭松棻先感性地抒發了台灣歷史的不幸所造成的「感覺結構」，可以說相當深刻地理解了這種主張的悲情緣起，尤其是造成迄今台灣社會依舊尚未真正癒合的「二二八事件」，更是他在文章中要特意點出的關鍵問題：

隨著二二八革命的失敗，每個「台灣」人民的口裡都含著一段歷史的苦澀。一夜之間，台灣一萬以上的優秀的人才，在國民黨瘋狂的機槍掃射下倒下，一夜之間，島上各地的台灣家庭被推入殘死、虐殺的不幸的陰影下。二二八革命後，每一天，每一分鐘，幾乎每個台灣家庭頓時喪失了喜悅的權利。幾乎每個家庭都經驗了自己父親的被殺，或兄弟、或親戚、或朋友的被殺，或被捕，每個夜晚，每一家台灣人在門的裡面，下意識的等待著國民黨特務的腳聲踏上門來，敲打死亡的門嚮。對抗外敵的捐軀是一種歡悅的意願，然而自己被「自己的政府」，在瞬息之間蠻橫地虐殺殲滅，那是怎麼也死不瞑目的。這一萬多死者的冤魂流迫到世界各地，不管白晝或黑夜，淒泣地呼叫著雪恥澄冤，這一股憤怒的，冤屈的冥域的呼喊便化身為當世的「台獨運動」。⁴⁸

郭松棻會這樣解釋台獨運動興起的原因，跟他自身的成長記憶有所呼應，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有著聽見槍聲的親身經驗，事件結束後隨之進行的大逮捕與槍斃，也經常可以從報紙上讀到相關消息。⁴⁹ 由郭松棻此處對二二八事

47 同註46，頁55-56。

48 同註46，頁56。

49 簡義明，〈附錄：郭松棻訪談記錄〉，郭松棻，《驚婚》（台北：印刻出版社，2012.07），頁218。

件的思考與關懷，也讓我們對他後來重回小說創作之後，始終對這段時期的生命經驗與糾結的時代問題多所記掛找到了思想與情感政治上的關鍵聯繫。至於郭松棻所指出的為何有台灣人民主張台獨的四點問題，還是跟他的歷史眼光有關，郭松棻的邏輯是，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的統治，因而主張台獨，但如果不能把美、日強權文化在背後支配的因素考慮進去，真正的台灣獨立是不可能的，是玄想的，終究還是會被帝國主義所控制。相較於香港的「回歸論述」對於台獨運動的無情批判，對中國統一大業的天真樂觀，顯然郭松棻的論述是較為辯證性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推動、領導保釣運動的包奕明，在他擔任主編的《生活與學習》月刊第7期「保釣專輯」中，收錄了郭松棻〈打倒博士買辦集團！〉、〈台獨極端主義與大國沙文主義〉這兩篇長文，就現有的訪問與資料中，我並無法確認當時包奕明和郭松棻有無直接的聯繫，但原本受到香港「回歸」思潮影響的美國保釣知識圈，卻在釣運如火如荼展開之際，也提供了香港在運動的戰線方面思想的彈藥。當然，海外這些比較基進的，在冷戰結構中，採取第三世界左翼觀點來思考問題的保釣刊物，也是透過各種管道與方法，傳輸回台灣內部，刺激並影響了島嶼上對此運動多所關注的知識分子。⁵⁰

羅永生曾經這樣論斷包奕明所捲起的風潮：「香港在1960-70年代的「回歸」論述，和往後在1990年代真實展開的『回歸』過程，只有稀薄的傳承關係。事實上，1960-70年代的『回歸』論述爭議，影響力亦只及於活躍於政治的部分青年學生。」⁵¹可是如果我們把北美的保釣論述放進來一起審視即可

50 如鄭鴻生就有過這樣的敘述：「劉大任與郭松棻兩人在出國前就都屬於與陳映真一樣有著強烈社會意識的作家，在當年的知識青年中擁有不少讀者，也是我們敬仰的前輩。我們在流入島內的海外保釣刊物上，讀到了這些前輩開始發展出來的批判帝國主義霸權的第三世界左翼立場，他們在思想上的激進發展自然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與鼓舞。他們在這些保釣刊物譬如《戰報》上面還大量引用魯迅的批判文章，譬如「打落水狗精神」，批判某個國府駐美官員。對於當年只讀過《阿Q正傳》，只知道魯迅悲天憫人那一面的我們，很驚喜地發現他戰鬥氣概的這一面。海外保釣運動左轉之後，寄來的書刊也開始有所反映。這些書刊從保釣運動的號角轉為統一運動的法螺，同時出現了左翼的聲音，以第三世界vs.帝國主義的觀點來解釋中國的近代史與台灣的處境。這對我們是一種全新而令人震撼的視野。」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12），頁127。

51 羅永生，〈六、七〇年代香港的回歸論述〉，《思想》19期，頁139。

發現，至少在加州柏克萊大學，以劉大任、唐文標和郭松棻為核心的「大風社」成員，他們思考當代中國問題的起點，以及後來決定投入保釣運動的實踐，其實就是這股香港「回歸論述」的延續與擴大。因為一場國際局勢中區域衝突的政治事件，而將台灣、香港、北美中國留學生陣營這幾個地方的知識分子與言說牽動在一起，雖然有著某種歷史的機遇所牽連與促成，但我認為這幾個地域與時空中的具有現實主義傾向的思潮之呼應、擴大與加深，實有其更為內在的聯繫性。當然，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與思潮，裡頭有非常複雜的社群與意見分歧，以劉大任的回顧來說，至少可分三大陣營，分別是「國家統一派」、「獨立建國派」和「革新保台派」，⁵² 這樣的劃分只就後設的國家認同去界定，實在無法詳細看出每個參與運動的知識分子之思考與心路歷程，加上這幾年因為政治與現實中的保釣問題，依舊懸而未決，老保釣也在學術單位的邀請之下重新聚集，以回憶的方式重構了歷史現場，⁵³ 但現下的發言是否就等同於歷史的痕跡，還是已經雜揉了爭奪歷史發言權的角力？我以為比較公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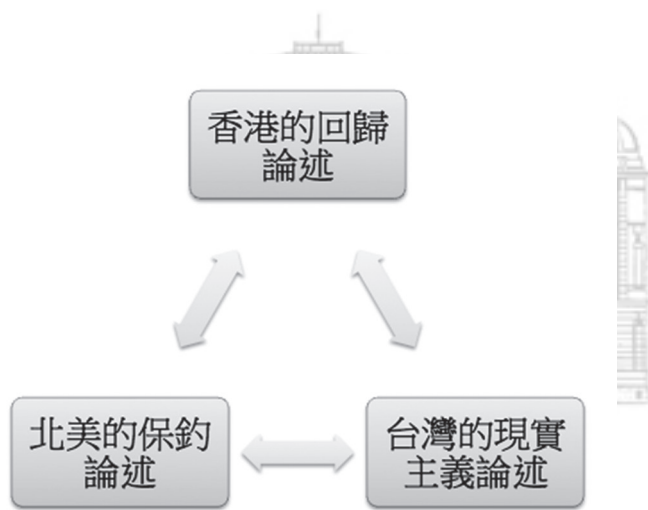


圖1 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末期，台港文藝思潮互動圖

52 劉大任，〈反思〉，謝小岑、劉容生、王智明主編，《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11），頁272。

53 這些歷史記憶與發言可以參見上註所引《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一書的紀錄，以及劉容生、陳光興、王智明主編，《東亞脈絡下的釣魚台：繼承、轉化、再前進》（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10）。

評價與理解方式，還是得回到歷史現場，從基本的史料重建與文獻解讀的工作開始，並且，如果能將保釣運動與論述的疆界打開，和之前的香港回歸論述與之後的台灣現實主義論述，當成相互影響與流動的整體來思考（如圖1），才能真正釐清那段時期許多糾結的文學與文化議題。如此一來，日後我們在討論台灣文學史的脈絡時，就不能僅僅侷限於台灣的框架，也不能以簡單的影響論或架空的東亞想像來整編與置放。

最後，我們在追索這些不同時空語境之下的文獻與思潮之干涉與互動時，亦不應該將它們從歷史脈絡中抽離，在冷戰的世界格局審視之下，我們必須關注美國透過其國際強權的領導地位，企圖藉由種種手段與機制滲透與掌握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濟、外交、文化等發展。「美新處」的設置即是想要藉由財力資助與文化扶植的手段，影響不同地域的文藝生產走向、進而打造親美的意識型態。⁵⁴ 本文所討論的這條偏向現實關懷的台港文藝互動軸線，並非那個時空下唯一的文化生產路徑，事實上，目前學術界在討論台港文藝跨地域之間的互動時，較常梳理的是現代詩和現代主義這個主題，⁵⁵ 將這些不同路徑的台港文藝傳播與交織的網絡進行更辯證性的討論，應該是下個階段值得進一步開展的議題。



54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愈來愈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可參見吉見俊哉著，邱瑞振譯，《親美與反美：戰後日本的政治無意識》（台北：群學出版社，2013.02）；貴志俊彥、土屋由香、林鴻亦編，李啟彰等譯，《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台北：稻鄉出版社，2012.06）；黃愛玲、李培德編，《冷戰與香港電影》（中國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9）；蕭敏亨，〈美國冷戰時期的文化外交與美國形象的塑造：美國新聞總署及《今日世界》的發行〉（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陳建忠，〈「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國文學報》52期（2012.12），頁211-242。

55 可參考陳國球，〈香港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與李英豪的文學批評〉，《中外文學》34卷10期（2006.03），頁7-42；須文蔚、余少君，〈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紀弦台港跨區域文學傳播影響論〉，「香港文學在台灣」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主辦，2012.05.04）。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吉見俊哉著，邱瑞振譯，《親美與反美：戰後日本的政治無意識》（台北：群學出版社，2013.02）。
- 李渝、簡義明主編，《郭松棻文集·保釣卷》（台北：印刻出版社，2013.11）。
- 林國炯等編，《春雷聲聲：保釣運動三十週年文獻選輯》（台北：人間出版社，2001.09）。
- 尉天聰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遠景出版社，1978.04）。
- 郭松棻，《驚婚》（台北：印刻出版社，2012.07）。
- 貴志俊彥、土屋由香、林鴻亦編，李啟彰等譯，《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台北：稻鄉出版社，2012.06）。
- 黃愛玲、李培德編，《冷戰與香港電影》（中國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9）。
- 黃錦樹，《文與魂與體：論現代中國性》（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05）。
- 劉大任，《我的中國》（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00.07）。
- 劉容生、陳光興、王智明主編，《東亞脈絡下的釣魚台：繼承、轉化、再前進》（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10）。
- 蔡明諺，《燃燒的年代——七〇年代台灣文學論爭史略》（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11）。
- 鄭樹森，《結緣兩地：台港文壇瑣憶》（台北：洪範書店，2013.01）。
- 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香港新文學年表（一九五〇～一九六九年）》（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0）。
- 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12）。
- 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雙程路：古兆申訪談錄》（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04）。
- 謝小岑、劉容生、王智明主編，《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11）。
- 龔忠武等合編，《春雷之後：保釣運動三十五週年文獻選輯》，（台北：人間出版社，2006.07）。

Alain Touraine著，舒詩偉等譯，《行動者的歸來》（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05）。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刀口聽，〈簡評包錯石主筆的「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盤古》13期（1968.05），頁28-29。

包奕明，〈民主社會動員下的道德多數、少數和知識份子〉，《明報月刊》3卷4期（1968），頁2-13。

包錯石（包奕明），〈再論中國知識份子和全中國國情研究的關係〉，《盤古》12期（1968.04），頁6-12。

——，〈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上），《盤古》8期（1967.10），頁24-33。

——，〈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下），《盤古》9期（1967.12），頁31-37。

包錯石（包奕明）、陳齊合著，〈關於「美國的挑戰」〉，《盤古》16期（1968.08），頁26-29。

包錯石主筆，〈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張懷人、邵先凡、陳齊、胡莒、孫行、林向華、夏喬峰、葉影華、張介武、黃韶鎮、蒙樸等人合意），《盤古》10期（1968.01），頁2-16。

李金曄，〈為發「回歸」熱的人醫病——從包錯石的文看包錯石〉，《盤古》17期（1968.09），頁2-5。

胡菊人主筆，〈海外中國人的回歸與中國生活方式的重建、創建與實建〉（包奕明、林悅恆、胡菊人等人合意），《盤古》11期（1968.02），頁2-6。

淺井基文著，鄭宏譯，〈我所認識的陳映真以及1960年代的台灣〉，《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6期（2012.03），頁345-363。

郭松棻，〈中國近代史的再認識〉，《大風通訊》（1970.05），手稿。

——，〈當頭棒打自由主義者〉，《戰報》1期（1971.02），頁17-21。

陳建忠，〈「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國文學報》52期（2012.12），頁211-242。

陳國球，〈香港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與李英豪的文學批評〉，《中外文學》34卷10期（2006.03），頁7-42。

謝基民（唐文標），〈困獸之鬥的港台文學〉，《盤古》49期（1972.08），頁47-52。

簡達（郭松棻），〈台獨極端主義與大國沙文主義〉，《戰報》2期（1971.06），頁52-59。

——，〈打倒博士買辦集團！〉，《生活與學習》7期（1971.08），頁25-38。

羅永生，〈六、七〇年代香港的回歸論述〉，《思想》19期（2011.09），頁117-140。

羅隆邁（郭松棻），〈談談台灣的文學〉，《抖擻》1期（1974.01），頁48-56。

羅龍邁（郭松棻），〈打倒博士買辦集團！〉，《戰報》2期（1971.06），頁40-48。

鐵曇（郭松棻），〈阿Q與革命〉，《盤古》36期（1971.01），頁32-33。

（二）學位論文

簡義明，〈書寫郭松棻：一個沒有位置和定義的寫作者〉（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

蕭敏亨，〈美國冷戰時期的文化外交與美國形象的塑造：美國新聞總署及《今日世界》的發行〉（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三）研討會論文

須文蔚、余少君，〈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紀弦台港跨區域文學傳播影響論〉，「香港文學在台灣」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主辦，2012.05.04）。

三、報紙文章

不具名，《中央日報》，〈周彤華籲僑社警覺 謹防野心分子 破壞愛國運動〉，1971.04.08，2版。